

殊方异物与中古园林中的地理空间意涵

龚 珍

(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9)

摘要: 中古时期的园林文献中常见关于异物的记载。这些异物大都是来源于边远地区的方物, 包括奇花异卉, 名果异树, 珍禽异兽等, 它们的引入维持住了中央权力阶层对于边远地区异质文化的空间想象。园林对异物的容纳度与园主的政治权力正相关, 也表征了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园林超越生存空间的本质。随着地理空间的拓展受限与文人地位的崛起, 宋代以后的文人园林文献中关于异物的记载逐渐消失。

关键词: 殊方异物; 园林; 地理空间; 超越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1) 04-0026-07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1.04.005

Exotic Objects and the Meaning of Geographical Space in Medieval Gardens

GONG Z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610039)

Abstract: The records of exotic objects are often found in the garden literature during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They were mostly delivered from remote areas, including exotic flowers, strange fruit trees, and rare animals and so on, which maintaine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from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o the remote areas. Positive correlation could be found between the garden's acceptance to the exotic objects and the gardener's political power, which symbolizes essence of the garden beyond the living space. With the limita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 and the social status of literati, the records of exotic objects in garden's literature from literati gradually disappeared after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exotic objects; garden; geographical space; transcendence

中古时期涌现了大批私人撰著的“异物志”,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①但是对于异物记载大量出现的原因, 却众说纷纭, 暂无定

论。^[1-2]从完整的传输路线来看, 这类异物从异域进入汉文化区后, 很大部分都被集中在了当时权贵的园林之中。因此, 如果我们把考察的焦点从边远

收稿日期: 2021-06-26

作者简介: 龚珍 (1986—), 女, 四川成都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景观史研究。

①清人张澍《儿西堂丛书》, 曾钊《岭南丛书》, 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等辑有部分《异物志》佚文。今人张崇根《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农业出版社, 1981年版), 缪启瑜、邱泽奇《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 1990年), 吴永章《异物志辑佚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等都对部分异物志著作进行了整理; 刘伟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收录了《异物志》佚文十二种。王晶波《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 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S1期; 邱泽奇《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考略》, 载于《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在前人基础上整理了异物志名录; 胡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 载于《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王晶波从文学渊源上《从地理博物杂记到志怪传奇——〈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与古小说的关系》, 载于《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梳理了异物志流变过程。以及异物志单篇研究的成果也层出不穷, 如邱泽奇《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选(一)——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于《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 刘小斌等《杨孚〈异物志〉与岭南药用动植物》(载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此外, 还出现了不少以此为研究主题的学位论文。

地区切换至中古时期的园林当中，来对彼时的异物做一点研究的话，或许会有益于理解中古时期异物记载变多的原因。

一、园林异物与异物的形成

在中古时期的园林文献中，常常可见文人群体对来自各地方物的喜爱之情的记载。例如，白居易的《池上篇》序文记载：“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3]1450}谈到履道里宅园中安置了从杭州带回的“天竺石”和“华亭鹤”，以及从苏州带回的“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等物。于是，他还在《池上小宴问程秀才》一诗中，颇带几分得意地问对方：“停杯一问苏州客，何似吴松江上时？”^{[3]639}显然认为，据有这些江南景物的自家园林已经造就出了吴淞江上的风光。

除了此类，还有一种因为不常见而显得十分珍贵的方物，即异物。《书·旅獒》记载：

明王慎德，西夷咸宾。无有远迹，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迹人安。^[4]

太保作《旅獒》是为了训德，规训君主对物的眷恋。这段资料提到，远夷为了表示臣服，上贡了当地的特产，而这些特产对于接受方物的“宗主国”来说是非土产的“异物”，所以君主觉得很珍贵。但是，太保认为獒这种珍禽奇兽不如服食器用，只会让人玩物丧志，珍禽奇兽不育于国，君王不宝远物，才能成就大德。可是，有如此大德的君王在历史上极为少见。到了唐代，元稹《驯犀》还记载：“贞元之岁贡驯犀，上林置圈官司养……行地无疆费传驿，通天异物罹幽枉。”^[5]元稹也将这种岁贡的犀牛称为异物，并对这种征收贡品的政策进行了道德谴责。

当然，早期社会中的这些异物并不止于珍禽异兽，还有奇花异卉、奇异怪石之类，兹以私家园林的极端案例——李德裕的平泉山庄为例：

嘉树芳草，性之所耽。……因感学《诗》者多识草木之名，为《骚》者必尽荈荈之美，乃记所出山泽，庶资博闻。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树，嵇山之海棠、榿、桧，剡溪之红桂、厚朴，海峤之香桧、木兰，天目之青神、凤集，钟山之月桂、青虺、杨梅，曲房之山桂、温树，金陵之珠柏、栲荆、杜鹃，茆山之山桃、侧柏、南烛，宜春之柳柏、红豆、山樱，蓝田之栗梨、龙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苹洲之重台莲；芙蓉湖之白莲；茅山东溪之芳荈，复有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湍、庐阜、漏泽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园之所有，今并不载。……己未岁，又得番禺山茶，宛陵之紫丁香，会稽之百药木芙蓉、百叶蔷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邢卫。台岭、八公之怪石，巫峡之严湍、琅琊台之水石，布列清渠之侧；仙人迹、鹿迹之石，列于佛榻之前。是岁又得钟岭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红桂，嵇山之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东阳之牡桂、紫石楠，九华山药树、天蓼、青枳、黄心椴子、朱杉、龙骨□□。庚申岁，复得宜春之笔树、楠稚子、金荆、红笔、密蒙、句栗木。其草药又得山姜、碧百合焉。^{[6]232}

李德裕官居相位，权势显赫。各地的地方官竞相奉献各式花、木、草药、水生植物、奇石等异物，他都将一一安置在平泉山庄内，故有“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致”之效果。^[7]

这些各地所产的奇花异卉、珍奇异兽、嶙峋怪石是如何成为异物的？郭璞在《山海经》序中提出了一种观点：

世之览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故胡人见布而疑麋，越人见麋而骇毳。盖信其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8]478}

异物之“异”，是对于刚开始接触的陌生人群而言。易言之，人群在接触在前所未见，或很少见到的东西时，会因为陌生而产生一种他者的文化异质感。

众所周知，中古时期出现的南方异物志所记大

抵皆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异物，尤其是集中在华南之南，岭南以及沿海一带。对此，王庸认为这类异物志所记多草木禽兽以及矿物之属之异于中原者，而间附以故事神话，是当时北方士民向南移动的一种事实印证。^{[1]133-141}胡宝国不同意此说，他提出异物志最早出自东汉时期，地域范围为荆扬以南的交、广等地，在当时尚未发生北方士民大量南移的情况。在四通八达的地区难以找到一般人没见过的异物，才会欲求异物，把目光集中到人迹罕至而又物种丰富的南方偏远地区。简而言之，胡宝国赞成异物来源于想象，根源于汉晋时期求异的风气。^{[2]13-25}

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个观点进一步澄清：对于远方异物的想象与记载，并不是汉末才出现。首先，正如胡宝国所言，汉末的异物志与早于汉代图经地志的《山海经》及模仿《山海经》的《神异经》《十洲记》存在着继承关系。其次，这种对异物的兴趣在秦汉时期也没有发生过断裂。在汉代以前，来自东北地区的齐、赵和燕的方士游行各地，广泛传播有关东海中蓬莱仙岛的神话。作为他们频繁活动的结果，人们对不死之地的求索也多是指向东方。^[9]之后，西汉初年到西汉中期，人们开始越来越留意到西方。很明显，这与汉王朝在西域的经营互为因果。东汉末年，受阻于北方戎狄的军事势力，汉民族的开发重点才开始转向此前人迹罕至的南方。并且，山水地志在晋宋时期取代异物志的中心地位之后，唐代其实还存在诸如沈如筠《异物志》、孟管《岭南异物志》、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刘恂《岭表录异》之类专著出现。^[10]而且，山水地志的出现也很难与文人求异的兴趣脱离开来。以山水诗文著称的谢灵运本身就是一个“寻异景不延”的猎奇者。^{[11]83-85}我们也常在文献中看到唐代山水文人对奇异风景的热爱，例如，王

维自称“玩奇不觉远”，^{[12]460}还有“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13]这种背景让笔者认为，古人对于异物的兴趣可能比史学理论渊源上的表现来得更为久远且顽强。

因此，考虑到秦汉时期对东、西方的兴趣，异物志的书写未必是迁入之后的成果，从地理背景上来说，很有可能是“开发”欲望驱动下“变异为常”殖民心理的外化。^①这种心理，我们还能从平泉山庄移缩地貌的记载中找到旁证，《剧谈录》记载：

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14]34-35}

远方地貌被模型化成了统治阶层园林中景物，这类景观中包含着的生/熟二元转变的动力，是一直都流淌在汉族文人血液中的“情存远略，志辟四方”，混一六合的大一统情怀。当边界很明确地放在面前时，尤其是那些行走在边缘的人，例如贬官、使臣以及远戍边将等，会产生明确的需求来标榜自身的文明与蛮荒之间的对立，所来的文明圈与所去的边缘区的不同，通过这种“区分”来加强自身所中心地区文化身份认同。从而，书写异物就成了“边缘效应”的一个表征。

二、殊方异类及其空间隐喻

美国人类学家魏乐博（Robert P. Weller）在结构主义认知上再进一步，他认为古代中国的自然概念存在着多样化的现象，其中帝制权力从中心向下拓展的村庄层级结构的朝贡体制，与包括了社会、地理、认知意义上的边界在内的由非汉人地区构筑而成的有力边陲，是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中最

①李约瑟认为，从东汉到南北朝记述中原以外地区物产和风土人情的“志”“状”“记”一类著作成为一时之风气的背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秦汉统一以来，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二是东汉以来中原以外地区开发的加快。在这种情况下，中原人产生了增加对中原以外地区了解的强烈愿望，而中原人对中原以外地区的知识也在逐步积累之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类“志录”类著作。参考[英]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二分册《农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郑毓秀认为，魏晋之前汉赋所呈现的自然图像，比如说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或扬雄的《甘泉赋》，我们看到的是字里行间挤满了各地的珍禽异兽、名物特产。这些花草鸟兽不管是否全属实情，或半夹传闻，它们呈现的目的，可说是为了“体国经野”，实在替帝国的荣光作见证。参考郑毓瑜：《归返的回音——地理论述与家国想象》，载《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55-114页。

明显的两重结构。后者与对山川和其他中介空间的想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除了对中心地区造成了暴力威胁外，更提供了一种权力的想象。^[15]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就会发现古典园林中的“异物”也存在着对边地想象的痕迹，诸如汉武帝征服南越后，建扶荔宫移植荔枝等南越地区的奇草异木。^[16]上林苑中充斥着二千余种“名果异树”“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等殊方异类，即是对西域及南越诸国权力想象的载体。^{[17]6-7}除此以外，对东方的想象也明显夹存于园林之中，最典型的即是“一湖三仙山”的模式：

揽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嶙嶙，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崔嵬，金石峥嵘。^[18]

这种“一湖三仙山”的景观模型被后世继承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了清代皇家园林及公共园林之中。

此外，园林中的“异物”还存在着其他的渊源。例如，李德裕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为自己搜刮异物的行为辩护：“学《诗》者多识草木之名，为《骚》者必尽荇荃之美。”^{[6]232}除了儒家传统的博物观和《离骚》香草比德之类的思想之外，还能看到与之交织的天人感应说，王维《为相国王公紫芝木瓜赞》记曰：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天为之降和，地为之嘉植，发书占之，推理可得。何者？人心本于元气，元气披于造物。心善者气应，气应者物美，故呈详于鱼鸟，或发挥于草木，示神明之阴隲，与天地之嘉会。今中书侍郎相公先生左丞府君，沉潜上德，遐尚绝轨，江海滢沆，婴孩杏坛，高门长轨，隐几含素，盖凤凰之高逝，薄龙虎之逶迤。积有淳德，诞敷余庆。而我相公生而英姿，河目海口，量与太素而无端倪，应会神速，动若发括；事遣理尽，淡然虚空，亦犹太清，云无处所。重玄之旨，达而有余奥，大白之明，漫而不及理。^{[12]1101-1102}

这样，与众不同的异物就与君子超群的德行连接在了一起。这种颇带宗教色彩的思想与对仙界的想象是一致的，仙界中总是充斥着各类奇花异卉，异石美玉之类，诸如“悬圃”，是昆仑山顶的神仙

居处、黄帝之下都。《山海经》《淮南子》等书记载，悬圃之下有山，四季都刮着清爽的凉风。凡人一旦登上了此山，即可成仙而长生不死。^{[8],[19-20]}这些异物的作用可能是为了标志仙界与人间的不同，对仙界的想象超越了凡俗生存空间的限制。魏晋时期的士人在宗教心理的驱动下，探索神秘地理的风气很浓厚。这也是彼时山水再发现与宗教内向性超越的一个时代背景。^[21-22]这与胡宝国所说的“异物志”的书写是在宗教因素驱动下的求异心理相一致。可是，这也会让我们进一步追问，这种求异心理又是为何？如果参考此时士人对仙界的想象与对异物的情怀，“异物志”所涵盖的心理是否也具有力图超越日常空间限制的意味？而这种超越限制的心理与在地理范围上的“情存远略，志辟四方”是否也是内外一体？

简而言之，边地异物元素的出现并非凭空而来，有其地理接触的背景，并且在帝国经略越是明确时，这种对抗性的力量就会将文化的异质性想象在中心地区中突显得越为明显。而贵族园林中的异物，除了这种象征了地理背景上的空间超越性之外，还具备了宗教情怀上超越生存空间的意味，有如《关中胜迹图志》记载：

唐宁王山池院引兴庆水西流，疏凿屈曲，连环卫九曲池，上筑土为基，迭石为山，植松柏，有落猿岩，栖龙岫，奇石异木，珍禽怪兽。又有鹤洲仙渚，殿宇相连，左沧浪右临漪，王与官人、宾客饮宴弋钓其中。^[23]

于是乎，贵族园林成为一种类似于地区文化陈列馆之类的想象力载体。自然，这类园林也必然会因堆积异物而奢侈过度，逐渐失去了活力。

三、即自性超越与异物的消逝

汉时著名的私家园林个案：“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放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鸚鵡、紫鸳鸯、牝牛、青尼，奇兽怪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其中致江鸥海鸥，孕雏产静，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身不能遍也。”这是一座模仿宫苑，充斥“异物”的私家园林，僭越的下场很惨烈，“广汉

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17][18]}富民袁广汉的例子从经济与权力地位上，基本上排除掉了普通文人照这种方式建园的可能性。^[24]

但是，到了六朝，社会动乱，占田制推行，给了私家园林转机。晋室南渡，随行而来的北方世族只能在过去未开垦的或土地使用价值较低的地区去求田问舍，于是占领山林川泽，建造了临山带水的庄园。^[25-26]这种建造在开垦前线的园林的形态是贵族游观空间的缩小版，日常生活所需与经济实体合而为一，分工清晰，供应世族大家的日常所需，农业经济的收获是其存在的最主要的原因，兹如徐勉介绍自己的庄园时所说：

聊于东田闲营小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由我经始历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荫，阡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迥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渚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芰莲。^[27]

强调在建造田中之园之时要“少寄情赏”，庄园在农业价值的基础上出现了作为附加成分的观赏价值，这成为文人园林诞生于农庄生活的标志，实际上还肯定了农业价值高于观赏价值的地位，那么，这部分观赏价值的艺术性又是如何得到提升？

黑格尔曾说审美活动是一种灵魂的解放，一种用以摆脱一切压抑和限制的过程，“我们在艺术美里所欣赏的正式创作和形象塑造的自由性。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艺术形象，我们都好像逃脱了法则和规律的束缚。”^[28]艺术的宗旨并非生存，而是超越，超越了动物生存的本能，屹立于高处。这可以解释文人群体在私家园林中创造出“闲情”的原因。

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谢灵运利用宏大气势，夸写谢氏祖宅始宁山居，通过自我的建构，比附宫苑，利用世家大族政治及经济上的优势与帝王相抗衡。^[29]但是“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于是他为自己辩解，“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不同非一事，养疴亦园中”，拉启了园林“养身”的序

幕。^{[11][114-116]}这种“养病”说成为区分已经模糊了边界的樵、隐身份不同的托词。此外，皇族身份的萧子显还在《南齐书·高逸传》中提出一个观点：“含真养素，文以艺业。不然，与樵者之在山，何殊别哉？”^[30]强调“文”对于身份区分的重要性，也传达了贵族文人群体对于“沦落”至深山隐居，与农樵无别的焦虑感。

相较于始宁庄园含带二山的情况，寒门陶渊明的小庄园规模小且简陋得多。^①自然，从宫苑主导的审美价值来看，这种小庄园的观赏价值更低了不少。并且，农、隐之间的重迭、粘着的部分在陶渊明身上表现得也更为明显，经济压力使得陶渊明没有谢灵运那般的贵族身份包袱，他感慨：“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既然躬耕才能获得衣食，那么干脆将自己的身份认同追溯到了长沮、桀溺两个隐士身上，进行自我安慰，“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31][84]}并且在另外一首诗中再次强调“辽辽沮溺，耦耕自欣。人鸟不骇，杂兽斯群。”^{[31][176-177]}一反孔子关于“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论断。但是，希望做到“人鸟不骇，杂兽斯群”的陶渊明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文人身份。他在《饮酒诗》中写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但是草类根本无法真正掩盖青松，一旦“凝霜殄异类”，就能“卓然见高枝”。他留下了“闲”作为“青松”的标志。叶朗说：“所谓‘闲’，就是从直接的实用功利活动中暂时摆脱出来。”^[32]北宋黄彻认为陶渊明和农人的不同在于：“尧舜之道，即田夫野人所共乐者，惟贤者知之耳。”^[33]易言之，陶渊明等人的“闲”就是文人多余农人谋生的那部分，超越了“耕也，馁在其中矣”的部分。而这份文人贤士才能觉察到的“尧舜之乐”的意识自觉，成为六朝时期文人园林顺利脱胎于农庄生活的先决条件，也制造了无限可能的观赏价值。而这种“超越性”与贵族利用异物标识空间的设置已有很大的不同。

①目前认为有三处：上京（里）闲居。这里有东窗，窗外有林园，即东园，园内有孤松，有菊，有东篱等；园田居（古田舍），僻处南野，座落在一个穷巷内，有草屋八九间，绕屋树木茂盛，宅前有水塘，即“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以及南里（南村）。参考（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附录《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第206-207页。

到了中唐时期，中国南部成为历史上汉文化圈最后一个被纳入的区域，从边远地区传输而来的异物在贵族园林中高频出现的情况就必然会出现调整。^①与此同时，世族大家逐渐解体，科举文人群体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唐代社会进一步扁平化。经由科举跻身上层的世俗地主不喜皇族门阀的铺排奢豪，于是，皇族代表的太平公主遭到了文人的嘲笑“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世家代表李德裕的平泉庄也受尽嘲讽。康骥《剧谈录》认为平泉山居是威权的产物。^{[14]64}到了科举制更为兴盛的宋朝时，情况还在持续发酵，文彦博指陈李德裕性奢恋物，夸权贪婪，文饰其非。^[34]文同批评李德裕搜刮四方草木，“定非端洁士”，“丑名终未已”。^[35]

提出了中隐观，并积极参与造园实践的白居易在《自题小园》中记述：

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
一坐十余载。

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
蔼蔼遥相对。

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鉴，
林乃为禽栽。

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
琴酒连夜开。

从此卿自足，不羨大池台。^{[3]818}

对准的是豪门园林“大池高馆不关身”。用鱼、禽等点缀的可亲的自然，顺接陶渊明式以“闲”为主调的小园林的发展脉络，又用亲朋宴会呼应了关于自足的“闲适”主张，故而“不羨大池台”。他关于小园的造景手法也一合中唐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建造简朴的园林传统，洛阳履道里池边的置石景观“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寻”，池西用嵩山石叠置驳岸“立为远峰势，激作寒玉声”，以小象大，立石成山。^{[3]638}利用拳石勺水营造江湖之想的造园理念，不仅有利于人工控制程度的加深，还提高了日常之物成为园林景物的可能性。

文人园林的景观布置无须再用奇异之物来度量地理空间尺度，闲情和省思为特色的“即自的超越”逐渐取代了异物标识的权力想象“超越”。^②从外部走向内心，或许是此类“异物”在后世园林中逐渐消逝的部分原因。^③这开启了中国古典园林的“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江南时代”，从此至明末的数百年间，园林才成为了文人生活的要件。^[36]

[参考文献]

[1] 王庸. 中国地理学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6.

①元结、柳宗元在湖南南部的文化创造，将地理扩展推向了极致。薛爱华认为文学作品对南越的鉴赏是由来已久的对江南美景的鉴赏的延伸。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大作家真正赞美热带地区的沿海平原[(美)薛爱华(Edward Hetsel Schafer):《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三联书店,2014年,第300页];(美)马立博(Robert B. Marks)著,关永强等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岭南的瘴气将汉人阻挡在低洼的河谷之外,使他们更倾向于定居在北部的山区,对瘴气免疫的泰语族群在低地耕作,而俚、苗、瑶则通过烧山在地势较高的地区从事游耕农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②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艺术中的超越,不应当是形而上学的超越,而应当是‘即自的超越’。所谓即自的超越,是即每一感觉世界中的事物自身,而看出其超越的意味。落实了说,也就是在事物的自身发现第二的新地事物。从事物中超越上去,再落下来而加以肯定的,必然是第二的新地事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2页)。所以,园林可以不必展现完全的景观,而用能够触发想象的事物作为开启神游的诱导因子,即可。视力所限的小尺度景色与空间留白,都可以转换化为无限的情思。

③准确地说,“异物”并没有消失,而是指涉意涵出现了转移。在宋以后的记载中,“异物”一词大多不再具有前世珍奇方物的意涵,而是培育或变异而成的具有新形态的植物品种之类,或者志怪小说中的妖魔鬼怪等。例如,宋王庭圭《次韵胡邦衡衡阳县瑞竹堂》:“双茎非别种,异物出时方。”(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二十五册卷一四五九《次韵胡邦衡衡阳县瑞竹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768页);宋卫宗武《是岁之夏,紫芝复生成丛大者,径七八寸》:“异物不易遇,其出由地灵。”(卫宗武:《秋声集》卷一,四库全书本);宋向子諲《西江月其六,老妻生日,因取芎林中所得异物,作是词以侑觞》:“几见芙蓉并蒂,忽生三秀灵芝。千年老树出孙枝,岩桂秋来满地。白鹤云间翔舞,绿龟叶上游戏。齐眉偕老更何疑,个里自非尘世”(《酒边词》,杂志公司,1936年,第11页)。

- [2] 胡宝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 [J]. 中国史研究, 2001 (4): 13 - 25.
- [3] 白居易. 白居易集 [M]. 顾学颉, 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4] 孔安国. 尚书正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485 - 492.
- [5] 元稹. 元稹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326.
- [6] 李德裕.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7] 张洎. 贾氏谈录 [M]. 四库全书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8] 袁珂. 山海经校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9] 顾颉刚. 汉代学术史略 [M]. 上海: 亚细亚书局, 1935: 9 - 12.
- [10] 王晶波. 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 [J]. 北京大学学报, 2000 (S1): 178 - 184.
- [11] 谢灵运. 谢灵运集校注 [M]. 顾绍柏, 校注.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 [12] 王维. 王维集校注 [M]. 陈铁民,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3] 李肇. 唐国史补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7: 38.
- [14] 康骞. 剧谈录 [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 [15] 魏乐博. 中国的多重全球化与自然概念的多样性 [M] // 苏发祥. 中国宗教多元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3: 3 - 20.
- [16] 三辅黄图 [M]. 孙星衍, 庄逵吉, 校定.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25 - 26.
- [17] 葛洪. 西京杂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8] 范曄. 后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1342.
- [19] 王贻梁. 穆天子传汇校集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20] 洪兴祖. 楚辞补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1] 杨儒宾. “山水”是怎么发现的: “玄化山水”析论 [J]. 台大中文学报, 2009 (30): 209 - 254.
- [22] 李丰懋. 洞天与内景: 西元二至五世纪江南道教的内向游观 [M] // 刘苑如. 体现自然: 意象与文化实践. 台北: 台湾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12: 38 - 80.
- [23] 毕沅. 关中胜迹图志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208.
- [24] 吴世昌. 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 [M] // 吴世昌. 罗音室学术论著: 第一卷 文史杂著. 北京: 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 1984: 321 - 362.
- [25] 唐长孺. 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 [J]. 历史研究, 1954 (3): 95 - 113.
- [26] 傅筑夫.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233 - 234.
- [27] 姚思廉. 梁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384.
- [28] 黑格尔. 美学: 第一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8.
- [29] 郑毓瑜. 性别与家园: 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56 - 113.
- [30] 萧子显. 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925 - 926.
- [31] 陶渊明. 陶渊明集 [M]. 逯钦立,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32] 叶朗. 欲罢不能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232.
- [33] 黄彻. 溪诗话 [M]. 四库全书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34] 文彦博. 文潞公文集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292.
- [35] 文同. 文同全集编年校注 [M]. 胡问涛, 校注. 成都: 巴蜀书社出版社, 1999: 200 - 202.
- [36] 汉宝德. 物象与心境: 中国的园林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233 - 251.

